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之十九



跋刊台湾文献丛撰百 选录

夏德仪 撰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 之十九

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 选录

夏德仪 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吉撰台湾文献从刊序跋选录/夏德仪撰.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7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3569-1

I. ①百… II. ①夏… III. ①台湾省-地方史-序跋-选集
IV. ①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940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mailto:xmup@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25 插页: 1

字数: 140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关于台湾历史文化的研究，现在差不多变成了一种“显学”。“显学”的出现，自然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也正因为它成为一种“显学”，势必要吸引太多的兴趣者前来参与。转眼之间，研究台湾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们，处处多有，层出不穷。

文献史料，是从事台湾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基础。但是当今众多的台湾历史文化研究者，似乎对于这一研究基础的建构并无太大的兴趣。大家忙于发表高论，至于文献资料的使用，尽可以抄来抄去，省事得很。

如此建构的“显学”，应验了中国人的两句老话：“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里面，固然有一些很有学术创建性的发见，但是更多的是“你说我也说”、“你抄我也抄”。

如此说过来抄过去，不能不抄出许多的“学术垃圾”。因此，研究台湾历史文化虽然是一种“显学”，但是很快也成了堆积“学术垃圾”较多的一个场所。

大概是我住的地方距台湾较近的缘故，我素来对于那些肯于踏踏实实地从事台湾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的学者怀有敬意。我以为，从事台湾历史文化的文献史料整理工作，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学术修养。即既要有明清史的学术修养，同时又要有台湾地方史的学术修养，二者缺一不可。因为台湾地方史的史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明清史料之中，缺乏明清史科学的修养，无从查找；而缺乏台湾地方史的修养，即使是十分精通于明清两代的史料，也往往会对其中所包含的区域史史料视而不见。众多的赶时髦的所谓台湾历史文化的研究者们，之所以不愿意从事这种

艰难的工作，其中的原因应该与此有些关系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组织学者编纂《台湾文献丛刊》，这部巨著成为当今研究台湾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文献史料之一。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大多是台湾高校的著名教授。其中夏德仪先生，就是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而辗转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达二十七年之久的明清史专家。夏先生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除了讲授中国通史课程之外，还讲授过明清史、通鉴导读、明史专题、明清史料导读、明清史专题讨论、史部要籍解題等等。当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规划编纂《台湾文献丛刊》的时候，夏先生就自然而然地被主事者所倚重，成为《台湾文献丛刊》的主要编纂者之一。

夏德仪先生的高足徐泓先生，如今是台湾明清史学界的标志性学者。由于同行兼同乡的因缘，徐泓先生以夏先生生前手稿《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一书见示。这些年来，我本人也从事台湾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深知这项工作的艰辛与落寞。如今捧读近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夏先生等前辈学人的治学风范，跃然纸上，令人敬佩叹息！于情于理，夏先生的这部手稿不应湮没于世。我愿借此《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出版之际，缀上数言，一以表达我对前辈学人辛勤开拓台湾历史文献史料荒原之功的崇敬之情，再者也祝愿大家一齐努力为台湾历史文化研究的“显学”，做出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陈支平 敬序

于2010年夏月

自序

我自1957年开始参与《台湾文献丛刊》编纂的工作，一直做到1965年，整整满了一百个月，因有别事，不再做了。在此期中，我于五十六部书上写了五十七篇弁言和后记。现在选出四十篇，依其内容与时代先后，辑成一书，题曰“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①。又编目次，列之书首。按此目次，可分四类：一为南明部分，凡八篇；二为郑氏部分，亦八篇；三为清代台湾部分，计二十三篇；四为日据时期有关台湾的零星报导，仅二篇。四类之中，以第三类所包事项最多，如康熙间朱一贵之乱、乾隆间林爽文之乱、嘉庆间蔡牵朱瀆之乱、同治间日兵之侵台、刘璈之巡台与光绪辛未之割台，皆为重工业之端。在载有弁言与后记的三十九种书中，有一书既有弁言，又有后记，故成四十篇。

若欲知道我参与此一工作之全貌，则有此书之末所附的一览表可供参考。

1993年11月30日

卓如谨序

^① 编者按：本书根据作者手稿编辑排版。原稿偶有笔误和出入，均经与《台湾文献丛刊》互校予以改正。所使用民国纪年径予改作公元纪年。

目 录

序/陈支平	(1)
自 序	(1)
一 明季荷兰人侵据彭湖残档弁言	(1)
二 南明史料弁言	(7)
三 野史无文后记	(10)
四 明季三朝野史弁言	(15)
五 思文大纪弁言	(16)
六 东山国语弁言	(17)
七 徐闇公年谱后记	(19)
八 黄漳浦文选弁言	(20)
九 郑氏史料初编弁言	(22)
十 郑氏史料续编弁言	(25)
十一 郑氏史料三编弁言	(27)
十二 郑成功传弁言	(28)
十三 从征实录弁言	(32)
十四 靖海纪事后记	(36)
十五 海上见闻录弁言	(39)
十六 靖海志后记	(41)
十七 台案汇录甲集弁言	(49)
十八 台案汇录乙集弁言	(53)

十九	台案汇录丙集弁言	(56)
二十	台案汇录丁集弁言	(58)
二十一	台案汇录戊集弁言	(61)
二十二	台案汇录己集弁言	(66)
二十三	台案汇录庚集弁言	(68)
二十四	台案汇录庚集后记	(70)
二十五	台案汇录辛集弁言	(73)
二十六	福建省例弁言	(74)
二十七	台湾番事物产与商务弁言	(77)
二十八	台湾兵备手抄弁言	(87)
二十九	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弁言	(93)
三十	甲戌公赎抄存弁言	(97)
三十一	巡台退思录弁言	(102)
三十二	清代台湾职官印录弁言	(118)
三十三	割台三记弁言	(120)
三十四	哀台湾笈释弁言	(122)
三十五	台战演义弁言	(123)
三十六	台湾志略弁言	(125)
三十七	番社采风图考弁言	(127)
三十八	天妃显圣录后记	(130)
三十九	彰化节孝册弁言	(136)
四十	台湾游记弁言	(138)
附录一	百吉参与台湾文献丛刊编纂工作一览表	(141)
附录二	跋百吉参与台湾文献丛刊编纂一览表	(144)
附录三	再跋一览表	(145)
附录四	徐泓、夏德仪先生行谊	(147)
附录五	傅月庵：我的太师父百吉老人	(155)

明季荷兰人侵据澎湖残档弁言

这本《明季荷兰人侵据澎湖残档》是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的《明清史料》乙编、戊编里所载红夷档案以及《明熹宗实录》里的红夷资料编辑而成的。

关于红夷的档案,在《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里载有八件,《戊编》第一本里载有两件。这十个文件竟有六个是残缺不全的。我把这些文件汇拢来仔细阅读之后,才知这《乙编》第七本六二四页的《澎湖平夷功次残档》和《戊编》第一本一~三页的《澎湖信地仍归版图残件》原是一个文件的前后两部分,因而把这两件放在一起,改称《澎湖平夷功次残稿一》和《澎湖平夷功次残稿二》。又看出《戊编》第一本第三页的《兵部题兵科抄出福建巡抚南、巡按姚会题残稿》和《乙编》第七本六〇三~六〇七页的《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残稿》也是一个文件的前后两部分,因而又把这两件放在一起,改称《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残稿一》和《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残稿二》。

《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第一页载有《天启红本实录残叶》一页,也是记述红夷事情的。这个残叶和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的《明实录》第四七五册《熹宗实录》卷二十八天启三

年四月壬戌日下所记红夷事完全相同。我把影印本的《熹宗实录》略加翻阅,随手又抄出六个有关红夷的文件。其中福建巡抚南居益的奏捷疏原出《两朝从信录》,《实录》于天启四年十月己亥日下用双行小字转录了《两朝从信录》这个奏捷疏。后面还附了《从信录》作者的注字,叙述南抚台发兵攻剿红夷的经过。再将这个奏捷疏和《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〇二页所载的《彭岛红夷拆城遁去残稿》对看之下,又知道这个残稿后面的残缺部分恰巧见于《从信录》的奏捷疏。换句话说,《从信录》的奏捷疏只节录了原本奏捷疏的最后一部分,而原本奏捷疏就是《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所载的《彭岛红夷拆城遁去残稿》。因此,又把这两件放在一起,一件改称《福建巡抚南居益奏捷疏》,一件称为《福建巡抚南居益奏捷疏节录》。

在将上述几个残稿整理之后,又连同那些见于《熹宗实录》的红夷资料,按照年月次序加以排列,便能看出天启年间中国对付红夷侵犯的情形。现在且作一简单的叙述。

据天启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实录》所载福建巡抚商周祚的奏疏,红夷自天启二年六月入我澎湖,专人求市。因为所请不遂,就驾舟骚扰福建沿海。他们虽被官兵堵截,颇有杀伤,但还要求互市。商周祚只允许他们遵照旧例,在咬嚙吧和闽南贸易,决不许在我内地另开互市之名,并且谕令速离澎湖,不许夷舟在汛守之地抛泊。

《实录》虽于天启三年四月初三日记商周祚“以红夷遵谕拆城徙舟报闻”,其实他是受了副将张嘉策的欺罔,红夷并未撤退,所以六月二十六日《实录》又载商周祚的奏疏,就说红夷背了“拆城徙舟”之约,只得速修战守之具,准备驱逐了。

天启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实录》上载了南京湖广道御史游凤翔的奏章。游凤翔是福建人,对于红夷侵据澎湖和闽中所受祸害,说得非常痛切。他还附带参劾中左所副总兵张嘉策的欺罔抚臣,意欲迁延以成互市。兵部因此将张嘉策革职,并令查勘澎湖、中左、浯屿、铜山各处守汛失事将领。其时福建巡抚商周祚已经卸任,新任巡抚南居益已经到职。所以同一天的《实录》上又载有南居益的奏疏,报告红夷仍旧据彭筑城,要挟互市。他认为“羈縻之术已穷,天讨之诛必加”,只有“略抽水兵之精锐五千,列舰海上,以张渡彭声讨之势;仍分布水陆之兵,连营信地,以为登岸豕突之防”。兵部赞成他的主张;熹宗皇帝也有圣旨,着他“督率将吏悉心防御,作速驱除”。俱见天启三年九月初五日《实录》。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渡彭捣巢的计划果然实现了。根据南居益的奏捷疏和《两朝从信录》的叙述,讨夷舟师是从天启四年正月里开始出发的,接着还派遣过两次援军。逐步布置,到六月十五日便誓师进攻,直逼夷城。七月十一日,夷酋竖起白旗投降。十三日动手拆城,二十八日拆完,夷舟十三只遁往东番(台湾)。于是多年逋寇,一旦剿除。

《实录》记南居益奏捷的奏疏在天启四年十月十八日。奏报平夷功次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当然都在奏捷之后。《澎湖平夷功次残稿》首尾仍有残缺,看不出奏报的年月。幸而《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的两个残稿拼凑起来却完全了,知道是在天启五年四、五月间办的。足见红夷一案,在天启五年应告结束了。哪知并未结束。原来太监魏忠贤恨南居益疏中无一字归美于他,而勘功按臣姚应嘉又

无称颂一语，他便把这次平夷的将吏功次一概抹杀，连所陈彭湖善后诸款也都搁置未行。直到魏阉失败，南居益起为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才在崇祯二年三月间再陈闽事始末，由兵部题请叙功，了却红夷一案。南居益的《谨陈闽事始末疏》是从《兵部题行澎湖捷功残稿》里面抽出来的；因为先看了这个奏疏，再读澎湖捷功的兵部题稿，头绪较为清楚。

以上出自《明清史料》和《熹宗实录》的十四个文件，是关于天启年间荷兰人侵据澎湖的事实。此外，还有崇祯七年的四个文件，都是从《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抄出来的。现在也把这四个文件的内容提出要点。

先是，福建巡抚邹维琏咨照兵部说：红夷初犯南澳、攻中左、继窥海澄、围铜山，他一闻警报，就檄调郑芝龙等带领舟师进剿，前后生擒红夷一百多名。先将伪出海王一名和夷目十三名槛送京师，余夷暂收闽狱，且待春和起解，或即就地正法。这批俘虏送到之后，兵部随于崇祯七年正月初七日将夷酋呷唎啖吧吐等十四名发交巡抚提督衙门监固，初八日题请择吉献俘。初十日奉圣旨批准了。

福建巡抚邹维琏和巡按路振飞又曾为守备傅元功剿夷阵亡，合疏请恤。据称，崇祯六年九月初六日，陆鳌守备傅元功在古雷吉钓湾与红夷作战，初获胜利，继被銃毙。他们认为这样奋不顾身的人，应当优恤。结果由兵部于崇祯七年正月十一日题请褒赠参将职衔。二十五日奉旨照准。

最后一件是兵部于崇祯七年六月间覆议福建巡抚路振飞题报红夷突犯南澳、泉南等处，确查失事情形的题行稿。据福建各级官员逐层的勘报，红夷于崇祯六年六月初一日进犯南澳。相持到初六日，我船被焚十只，我兵仅焚红夷哨

船六只，把总范汝樛被弹打伤，目兵死了十七人。防守南澳的副总兵程应麟不但不据实报警，反而饰功冒赏。六月初七日，夷船突入中左。中左是游击张永产的汛地。其时游击郑芝龙方从广东剿寇回闽、阁船燬洗，张永产也在泉州料理会剿船械，不意红夷猝至，兵船被烧掉十五只。他们都因此受到降级的处分，戴罪图功。七月初八日，夷船复犯中左。张永产麾兵抵御，乘胜穷追。后来还与郑芝龙获得料罗大捷，建有殊功。而漳蜀备总韩登坛等，或斩夷级，或焚夷舟，或擒活夷，也各有所表现。只是程应麟无功可赎。因此兵部议将程应麟革职，张永产、郑芝龙复其原衔，韩登坛等量行纪录。奉旨允准。

综观上述三个片断的事实，足见崇祯红夷又曾骚扰漳、泉。可惜资料不全，不知料罗大捷发生在这年几月，战况如何。更不知巡抚邹维琯所称生擒的一百多名红夷，是否料罗大捷的成果。

《明史·和兰传》对明季荷兰人和中国的关系有较为完整的叙述。传中所记万历三十二年红夷初据澎湖事，大概以张燮《东西洋考》卷六《红毛番》为蓝本的。此文已见本丛刊第一一九种《诸蕃志》的附录。沈德符《野获编》卷三〇也有《红毛夷》一则，述及万历年间红夷谋通贡市的事情。《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中又有一段记载税使高臬谋红夷通市的事情。这两个叙述都可供参考。沈有容往谕夷酋事，本丛刊第五六种《闽海赠言》卷二载有陈学伊作《谕西夷记》、李光缙作《却西番记》和池浴德作《怀音记》，都是写得有声有色的文章，尤其值得参阅。除上述这些文字外，关于万历时期的红夷交涉就没有更原始的资料足供参证了。

《和兰传》记天启年间红毛番侵据澎湖颇有错误。传谓“天启三年，果毁其城，移舟去”。这是误信了《实录》所记巡抚商周祚“以红夷遵谕拆城徙舟报闻”的缘故。其实红夷并未在这年撤离彭岛。傅又谓天启四年南居益遣军攻剿，红夷退去，“独渠帅高文律等据高楼自守，诸将破擒之，献俘于朝”。参以本书所辑资料，此说似有疑问。

按《熹宗实录》天启四年十月己亥日下转录《两朝从信录》叙述彭岛攻剿红夷之文，谓竖白旗请降的夷酋名叫“牛文来律”。又谓红夷被迫拆城，于“旧高文律所居”的大楼不忍拆毁。足见这座大楼是高文律旧日住过的，不是拆城之时高文律等据城自守。据南居益《谨陈闽事始末疏》，夷酋高文律是在攻剿澎湖之前被擒于厦门港口的。南巡抚曾具疏以闻，谓“俟荡平之日，俘解阙下”。彭岛既平，果将高文律解京，熹宗皇帝还“祭告郊庙，御门受俘，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

《和兰传》说到崇祯时期的红夷事情，对于崇祯六年红夷之犯漳泉、巡抚邹维琰之献俘京师以及郑芝龙、张永产的料罗大捷，都没有详晰的叙述，只笼统地说了一句“崇祯中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未免失之简略。

不仅《和兰传》有舛误略漏之处，就是《明史》里的南居益、沈有容、邹维琰、路振飞等传，关于夷事也都记得简单。这本以荷兰人侵据澎湖为中心的史料集倒有相当的价值，可惜缺了万历年间红夷初据澎湖的原始资料，而现存天启、崇祯时的文件又多残缺不全。因此，这本书被题为《明季荷兰侵据澎湖残档》。

1962年2月1日

南明史料弁言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沦陷,思宗殉国之后,吴三桂便引清兵入关,扫除流寇,占有黄河流域。同时,明朝的宗室和遗臣也在南京成立政府,力谋匡复。不幸福王昏庸,马、阮专权,到第二年(1645)五月里,南都就又覆亡了。于是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称帝于福建。他们虽然相继失败,但还有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桂王在两广黔滇继续抵抗清朝。后来桂王失败了,郑成功的子孙却仍以台湾为反清复明的基地,仍用桂王的年号,直到永历三十七年(1683)才为清朝所征服。所以清朝从顺治元年(1644)入关起,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台湾止,要经过四十年的用兵,才得统一中国。因此,这四十年是清朝统一中国的时期,也是南明努力奋斗的时期。

当清兵南下破扬州、陷金陵、转攻浙闽的时候,东南一带,民族情绪激昂到极点,各地起义抗拒清兵的不可胜数。如给事中陈子龙、吏部主事夏允彝等起兵松江,兵部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等起兵吴江,行人卢象观奉宗室瑞昌王起兵宜兴,中书葛麟、主事王朝昇等奉宗室通城王起兵太湖,主事荆本彻、员外郎沈廷扬等起兵崇明,副总兵王佐才

起兵昆山，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等起兵江阴，金都御史金声与邱祖德、尹民兴、吴应箕等起兵徽州宁国。江西方面，则有益王据建昌起事、永宁王据抚州起事、兵部侍郎杨廷麟据赣州起事。他们或近受鲁监国的节制，或遥与唐王通声气（见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二十六章《明人恢复事业之悉败》上）。监国元年（1646），鲁王被迫航海，走厦门。四年（1649），张名振迎鲁王入浙，占据舟山。于是浙江方面的反清运动又盛极一时，温、台、宁、绍诸遗民乘间争结山寨的不下数百处，而以四明大兰山王翊之军，上虞东山李长祥之军、上虞平冈张煌言之军为较坚整（见魏源《圣武记》卷八《国初东南靖海记》）。他们的反清运动虽都失败了，他们的热血丹心却被记载下来，如查继佐的《罪惟录》、《东山国语》和温睿临的《南疆逸史》等书便叙述了许多这些志士们的事迹。

这部《南明史料》是从中研院史语所刊布的《明清史料》各编中辑选出来的。凡分四卷。卷一有六十二个文件，自顺治二年迄四年。卷二有四十八个文件，自顺治五年迄七年。卷三有三十个文件，自顺治八年迄九年。卷四有五十一个文件，自顺治十年迄康熙元年。全书共计收了一百九十个文件，多数是清朝平定江、浙、皖、赣等省的军事报告和奏请制裁或招抚各地反抗分子的文件。虽然这些文件里充满了“叛贼”、“逆寇”之类的字样，但很可以看出当时东南各省民族情绪的高昂和反清运动的激烈，而为研究南明史事的好资料。因此我称这部书为《南明史料》。

郑成功及其后人的抗清复明事业，原亦属于南明范围，但因史料分量过多，另编《郑氏史料》。所以这部《南明史

料》的内容是以江、浙、皖、赣为中心的。但其中有些事情，也未尝不与郑氏有关，应请读者参阅《郑氏史料》。

1968年11月5日